

浅论《色戒》、《旗袍》的艺术渊源及创作特色

马 强

(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 辽宁 大连 116021)

摘 要: 1979年张爱玲根据“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案”中女英雄郑苹如的传奇一生为模板创作了《色戒》，2011年《旗袍》的问世再次将女英雄拉回到世人的面前。本文试图从“自由选择”到“历史抉择”，从父权社会的压制到现代女性意识的粉墨登场，从“庸常化”的人性“自我”到“精英化”的人性“超我”的三个角度来阐释两部作品的艺术渊源及创作特色。

关键词: 自由选择；历史选择；父权；女性；庸常；精英

中图分类号: J9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26X (2011) 09-0000-01

1979年张爱玲根据“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案”中女英雄郑苹如的传奇一生为模板创作了《色戒》，2011年《旗袍》的问世再次将女英雄拉回到世人的面前。同样一个创作题材，却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相差甚远的艺术阐释。郑振铎先生曾称颂这一事件的主人公郑苹如是“比死在战场上还要壮烈”的女英雄，但作家在面对这同一史实进行艺术创作时并不局限于陈述历史而是各自进行了艺术再加工，遵循了从“自由选择”到“历史原则”并举的创作方法，分别刻画了父权社会的压制和现代女性意识的粉墨登场，“庸常化”的人性“自我”和“精英化”的人性“超我”。

一、从“自由选择”到“历史抉择”

“自由选择”根据萨特的理论就是指上帝死了，人在这个世界上的行为言语等一切都是自由的。这一观点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但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作为一个单独的主体可以在现有生活中针对自己的支配范围进行“自由选择”，但同时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大环境中还有“历史抉择”，个人虽然并非对生存环境无能为力，但却需顺应历史的客观潮流。

张爱玲关注人的存在，强调人在命运面前的行动与自由选择，让人性在斗争或挣扎中显出生命的本质，呈现了一幅人人自危的时空，人被世界异化了，成了痛苦的、孤独的、绝望的存在物。正值妙龄的王佳芝想知道真正的爱，可她却“虚飘飘空捞捞的，简直不知道身在何所。”^{[1]258}出于人的本性，她每一次的自由选择都将自己向死亡推进了一步，也使自己一步步走上了张爱玲的历史抉择中“为爱一生”的性情女子之路。《旗袍》中作者对待“郑苹如刺杀丁默邨案”充分尊重了历史的本源，她必须做好牺牲的准备，必须面对溃败的爱情，必须放弃自己的艺术追求与理想，经受着生死煎熬。而创作这一故事的作者，正是享受着像关萍露一样无数的革命先驱浴血奋战打下天下的受益人。所以作品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作者对英雄的无限尊敬与崇拜。从而再一次证明了我们之前所提出的观点，作者创作时进行着“自由选择”，归根结底却是社会做出的“历史性抉择”。正如存在主义文学代表萨特的创作理论特别注重“境遇剧”。他认为：人的“自由问题不能抽象地提出，因为我们总是处在‘境遇’之中，介入特定的境遇里，这就迫使我们选择，建立我们的自由。”^{[2]522}

二、从父权社会的压制到现代女性意识的粉墨登场

传统作品中的女性角色，总给读者所造成的印象是“一种强制性的认同，它将女性置于次要的位置，把女性作为丧失了自我的形象置于这个世界的某个位置，以依附男性。”^{[3]53}。本文试图通过两部作品体现父权社会的压制到现代女性意识的粉墨登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4]309}在旧中国，由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观念和两性分工模式的塑造，女性处于“他者”的从属地位，其活动范围和生活空间也被限定在了极为狭窄的境地，长期局限于“贤妻良母”的家庭角色，遵守着生养孩子、满足丈夫的性要求、料理家务等传统使命。对于易太太而言，“婚姻是她得到供养的唯一方式”^{[5]489}，男权社会的角色定位和文化观念也决定了她隐忍压抑的命运和依附性的处境。作为易先生的原配妻子，她坚守着“易太太”一职，她心系丈夫安危，关心丈夫的身体状况和饮食，对丈夫“从一而终”，她对丈夫的“偷吃”装聋作哑，大度纵容，有意无意地为二人的偷情制造机会，充分体现出女性在父权制霸权下的压抑与无

奈。张爱玲曾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炼。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6]5}而易太太则是传统男权文化与“颓废”的现代都市文化交流后“不甚健康”的畸形产物。她有着都市文化影响下的享乐、趋时与虚荣，又兼具儒家文化塑造下的隐忍、压抑与“精明”，她是男权文化的被塑者、受害者和共谋者，是可怜而又可恨的旧上海“太太”的典型。在现代女性主义的影响下与《色戒》中易太太相应的角色丁太太，虽同样处于男权压抑下，但她并非完全被动地承受，丁太太想方设法捍卫自己“正妻”的尊严，对于丈夫要娶自己的干女儿——关萍露，她以死要挟日本人给自己做后盾，以李代桃之计搅乱了丁默群想要新人的美梦。丁太太的这一举动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在那个时代一个官太太敢于反抗夫权实属少见，不得不说是作者根据女性主义的一个出色创造。

三、从“庸常化”的人性“自我”到“精英化”的人性“超我”

西方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把人性分为三个部分，即本我、自我、超我。《色戒》中的王佳芝和《旗袍》中的关萍露分别就代表了人性的两个阶段。王佳芝在作品中的一切言语和行动均来自她人性中的自我，从一开始接受卢裕民的倡议成为革命女青年到放走了“猎物”的角色出轨，都源于她人性中的“庸常化”自我——爱。《旗袍》中的关萍露则占到了人性的最高层次——超我。在民族危难时刻，她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超我”的“精英”之路，她可以抛弃“本我”——与赵世杰之间的爱情，甚至是“自我”的生命。

自我的机能是寻求“本我”的冲动得以满足，它遵循的是为“本我”服务的“现实原则”。“自我”的王佳芝在爱欲的陷阱中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她不是一个合格的特工，因为刺杀易先生并不是为了国家存亡而是为了获得爱情，与卢裕民之间的可能爱情。超我是自我发展的最高阶段，超我是博爱的我，超我是孤独的我，超我是信仰中的我。在为民族大义这一方面，关萍露的人性因素中“超我”的成分占据了上峰。她是最最忠实的共产党员，却被世人误解为汉奸卖国贼，甚至连自己的恋人都痛恨她的自甘堕落。为此，她必须忍辱负重、背负骂名，在逆境中前行。虽然在通往理想的路上充满了荆棘，可这一切都不能阻止她作为一名精英化的革命青年为了祖国、为了人民的解放之路而做出的努力及牺牲。关萍露超越了人性的基础“自我”，达到了弗洛伊德所定义的那种“死的本能”，注重了来自肌体外部的刺激，遵循了超快乐原则。

参考文献:

- [1] 张爱玲. 色戒 [A]. 张爱玲文集 (第一卷) [C].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第258页。
- [2] 郑克鲁: 《现代法国小说史》[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8, 第522页。
- [3] 罗伯特·C. 艾伦. 重组话语频道 [M]. 麦永雄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第53页。
- [4]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第309页。
- [5] [法]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陶铁柱译.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第489页。
- [6] 张爱玲: 《到底是上海人》, 《流言》[C],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9, 第5页。